

新阶段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困局及破题之策

戴 翔

(南京审计大学 政府审计学院,江苏 南京 211815)

[摘要]近年来,针对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呈现的“乏力”现象,学界的代表性观点认为是结构调整和动力转换加快、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提高的表现。实际上,开放型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并不矛盾,而且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发展更能提升竞争力,从而有利于加快经济发展速度。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增速下降恰恰说明转型升级的速度未能适应“倒逼压力”下的新需求,竞争新优势的培育还未能充分弥补传统优势的丧失。面对国际和国内环境深刻变化的多重倒逼因素,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亟待破除转型升级的障碍因素,加快转型发展和竞争新优势培育。

[关键词]开放型经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转型升级;比较优势真空;贸易保护主义;金融危机;新常态

[中图分类号]F01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3114(2017)01-0037-08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强调指出,必须顺应我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趋势,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但是近年来,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却表现出“乏力”现象,比如作为开放型经济重要内容的外贸发展似乎已深陷“低迷泥沼”,突出表现为2012年至2015年中国外贸增长的预期目标分别10%、8%、7.5%和6%,而实际增长率则仅为6.2%、7.6%、3.4%和-7%,已连续四年未达到既定增长目标,并跌破过去长达约20年的两位数增速,特别是2015年中国外贸发展不仅没有实现预期目标,而且出现了2009年以来的首次负增长情况。对此,学术界有一些观点认为,如同中国的经济减速是正常的且是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一样,中国开放型经济从以往的高速增长进入中低速增长通道也是正常的,也是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中国开放型经济现在发展的思路和评价体系不能只关注速度,更应该关注效益,即要达到更高的水平、效率、质量,也就是所谓的迈向国际分工的“中高端”^[1-2]。甚至有学者认为,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速度下降恰恰是结构调整和动力转换加快、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提高的表现。不可否认,在外需持续低迷等多重因素倒逼的压力下,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确面临着向“中高端”攀升的迫切需求,但我们认为,开放型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并不矛盾,而且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发展更能提升竞争力,从而有利于加快经济发展速度。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增速下降恰恰说明转型升级的速度未能适应“倒逼压力”下的新需求,竞争新优势的培育还未能充分弥补传统优势的丧失。因此,培育开放型经济发展新优势和重塑增长新动力成为当前最为紧迫的任务。

二、中国开放型经济亟待转型发展的理论解读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否顺利融入全球分工体系,抓住经济全球化机遇,大力

[收稿日期]2016-07-1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6AJY018)

[作者简介]戴翔(1980—),男,安徽长丰人,南京审计大学政府审计学院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开放型经济理论与实践。

发展开放型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身的比较优势状况。虽然从理论上讲,不论处于何种发展阶段,比较优势是普遍存在的,但在实践中比较优势的发挥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尤其是在比较优势并不十分显著的情况下,其有可能会被其他因素掩盖和消除,从而丧失融入全球化进程的能力。因此,开放型经济转型发展和培育竞争新优势是特定发展阶段的需要,这一点无论是从理论角度来看,还是从实践经验来看,都有一定的依据。

Eeckhout 等学者曾经指出,在经济全球化发展时期,按照人均收入水平排列的各国长期增长率会呈现“U”型特征,即在人均收入水平比较低或者人均收入水平比较高的国家,其长期增长率往往相对较高;在人均收入水平处于中间状态的国家,其长期增长率可能表现出相对较低的发展态势^[3]。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相对于全球状况而言,不同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换言之,在人均收入水平较高的国家(富裕国家),从其要素禀赋优势来看,由于劳动者具有更高的技能和技术,因此在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会面临技能型和管理型岗位增加的机遇,从而带来长期高增长效应;在人均收入水平相对较低的国家(贫穷国家),从其要素禀赋结构来看,劳动者虽然不具备技能方面的优势,却能在非熟练就业岗位需求增加中获得更多机遇,从而也能带来一个长期的高增长效应。然而,在人均收入水平中等的国家(处于中间状态的国家),以上两个方面的优势均无法凸显,因此其会面临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困境。

从比较优势角度来看,我们对前述研究可以概括如下:处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阶段的国家,因为其处于科技创新前沿,所以其要素禀赋结构决定了其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上拥有比较优势,从而成为融入全球分工体系的受益者;处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阶段的国家,因为其劳动力丰富且成本低廉,所以其要素禀赋结构决定了在劳动密集型的低附加值产业上拥有比较优势,从而同样能够成为融入全球分工体系的受益者。相比而言,经济发展水平处于中等阶段的国家,由于受到“两头挤压”而使得其两类比较优势均不突出,因此其即便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融入全球分工体系,但获益会相对较少。当然,这种总结和概况可能不尽全面和准确,但基本上能够反映总体情况和变化趋势。我们不妨将陷入中间状态的情形称为“比较优势真空期”。对于“比较优势真空”问题,中国社科院的一项研究警示性地指出,中国在传统产业的比较优势丧失而新兴比较优势产业尚未建立起来的情况下,有可能面临着“产业断档”的风险^[4]。因此,面对“比较优势真空”或可能的“产业断档”风险,我们认为培育新的比较优势是中国经济进一步融入全球分工体系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唯一出路。

三、中国开放型经济亟待转型:经验与现实

前文我们从理论上分析了开放型经济转型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现在的关键性问题是如何识别一个国家或地区大致在什么样的阶段进入转型发展期。对此,我们认为可以从基于人均收入水平进行大体划分和研究的既有历史经验中获得一些佐证和启示,并结合目前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所处的现实阶段进行简要分析。

(一) 发展阶段与开放型经济转型:国际经验

根据世界银行 2010 年提出的标准,人均收入水平低于 995 美元的国家或地区为低收入组,人均收入水平处于 995 美元至 12195 美元之间的国家或地区属于中等收入组,人均收入水平高于 12195 美元的国家或地区则为高收入组。基于前述理论分析可知,开放型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也就是进入中等收入水平的发展时期。从既有经验来看,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转型发展的成功,关键就在于它们的人均收入水平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成功迈过了中等收入水平发展阶段而进入了全球高收入组。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作为未能成功转型的典型案列(如拉美国家)则恰恰是在进入中等收入水平后踟躇不前,甚至出现了波动。根据 IMF 的研究结果,截至 2011 年底,诸如智利、乌拉圭、墨西哥、巴西、哥伦比亚、阿根廷等拉美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行列组后已经分别“滞留”了 40 年、38 年、

37年、36年、32年和49年,未能成功迈入高收入行列。而俄罗斯的人均收入水平曾于2008年上升到11743美元,但2009年却又戏剧性地跌至8684美元。未能成功转型的原因正如世界银行的研究所指出的那样,面对不断上升的工资成本,上述国家作为商品生产者始终挣扎于大规模和低成本的生产性竞争之中,不能提升全球分工地位以及开拓以技术和知识创新产品与服务为主的高成长性市场^[5]。

当然,随着技术进步、制度创新以及资源利用能力的不断增强,全球经济发展总体上处于进步之中。换言之,从世界范围来看,产出增长的边界在不断扩大,因此使用人均收入水平的绝对数来划分一个国家或地区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可能并不完全准确和客观,但总体上能够给出一个基本的参照,因为人均收入水平往往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要素禀赋结构的现实状况,所以使用人均收入水平还是具有一定的道理和合理性的。当然,也有学者提出了相对来说更为合理的划分方法,比如将美国作为参照,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均GDP水平与美国人均GDP水平之比处于20%~55%之间时,则可视为中等收入水平行列组^[6]。总之,根据既有的历史经验数据,并考虑到全球经济发展的总体进步和世界范围产出增长边界不断扩大等情况,我们大体上可以判断并认为目前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基本上处于中等收入水平。

(二) 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所处的现实阶段

2014年中国人均GDP已经达到了约7575美元,从绝对数字来看,尤其是我国开放型经济较为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处于即将跨越中等收入水平而进入高收入行列组的关键临界点;从相对收入水平来看,即以美国人均收入水平为参照系来看,中国显然还处于中等收入水平行列组。当然,对于我国开放型经济亟待转型发展的现实需要而言,这不仅仅体现在人均收入水平这一表面数据已进入转型发展的关键点,更重要的是还体现在当前开放型经济发展面临严峻挑战形势。总而言之,前文所述的多重“倒逼压力”是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面临的现实约束条件。

第一,从全球经济发展的持续低迷状态来看,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全球经济增长“黄金阶段”被突如其来的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打断,这导致2009年全球经济下滑。为应对全球经济危机,世界主要国家联手采取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刺激政策,以期早日走出经济危机的阴霾。然而,刺激性经济政策虽然取得了一定效果,但并未实现期望的经济和贸易恢复性增长。时至今日,全球经济和贸易仍然处于后危机时代的低迷期,至今难见尽头。这种状况使得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全球经济已经进入到一个“新时代”,或者说进入了一个以经济增速放缓、失业率持续较高、贸易低速增长等为突出特征的“新常态”过渡时期。

第二,从新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来看,经济学理论特别是凯恩斯萧条经济学认为,当经济不景气时,一个国家或地区通过政府参与或对经济进行直接干预可以增加对本国或本地区产品的需求,从而构成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基础。但是,总需求的增加往往会产生“溢出”效应,即一部分需求会表现为对外国进口产品需求的增加,从而会弱化“乘数”作用。为了能够保护这种需求不至于“肥水外流”,甚至是追求通过进口需求的“内流”来刺激本国产出,在经济不景气的特殊时期,贸易保护主义的呼声会不断升高,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措施也便随之而生。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国际贸易陷入了一个增长的不确定时期,其难以琢磨的波动状态被人们解释为贸易保护主义的回潮。有学者研究总结指出,这次贸易保护主义的回潮从性质上看是贸易保护主义的升级,表现为从贸易保护主义升级为国际经济保护主义。这种国际经济保护主义不仅体现为进口国政府对传统产业的保护,还体现为对新兴产业的保护;不仅体现为对制造业领域的保护,还体现为对服务行业以及科技领域的保护;不仅体现为对产业和产品的保护,还体现为对融资和投资方面的保护。更重要的一点是,当今的国际经济保护主义比以往的贸易保护主义更加严重^[7]。

第三,从更多具有低成本优势的发展中经济体参与全球竞争的状况来看,目前,越来越多的发展

中国家意识到发展开放型经济的重要性,并参与到全球经济的竞争与合作中来。伴随着更多其他发展中经济体融入经济全球化,当前国际产业结构调整 and 转移呈现出一个重要的变动趋势,这就是全球制造业在继续向中国转移的同时也开始有目的地向其他发展中经济体(如越南、印度和菲律宾)转移。显然,这种发展趋势不仅与跨国公司开拓新兴市场、分散投资风险的考虑有关,还与跨国公司在全球优化资源配置、降低成本有关。这说明在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方面,中国面临来自更多其他发展中经济体参与所带来的竞争,也就是说,在承接发达经济体产业国际转移方面,中国面临着来自其他发展中经济体的潜在竞争。依据全球产业转移的规律,已经转移至中国的制造业或者中国本土的制造业同样有向其他发展中经济体转移的可能性,特别是转移到那些被认为具有潜在人口机会窗口的国家。对于已经深度融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的中国而言,面对这种趋势,其开放型经济发展基础显然面临着来自低成本竞争的巨大压力。

第四,从全球新一轮产业革命和技术革命的白热化竞争来看,如果说在全球经济深度调整期,发达经济体的“再工业化”发展战略尚不至于扭转全球产业分工格局,从而在中低端产业层次上还不至于对中国产业发展构成实质性威胁的话,那么为应对危机并实现经济复苏,各国在新兴产业领域展开竞争,力图抢占全球经济增长制高点并主导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将会使得中国产业攀升“高地”面临着白热化竞争。国际经济发展的经验表明,每一次重大经济危机都孕育着一次新兴产业发展浪潮,本轮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之后,各国基本上都将技术密集型等新兴产业作为未来发展的重点领域,试图在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发展中占领“制高点”。目前,不论是美国实施的以推动制造业回流和升级为目标“先进制造业”发展战略,还是德国大力推进的“工业4.0战略”,不论是英国实施的“高价值制造”战略,还是法国实施的“新工业法国”战略,其本质上都是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竞赛。总之,全球新一轮产业革命和技术革命的白热化竞争显然已经拉开了序幕。

第五,从国内各种生产要素价格集中进入上升期来看,近年来,要素成本的上升对传统低成本优势构成的挑战已经愈发凸显。国家统计局的统计资料显示,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以及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都呈现出大幅度提高的趋势。与此同时,近年来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步消损,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面临的“用工荒”和“招工难”等问题日益突出。由此我们可以预期和判断的是,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已经进入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的必然阶段。此外,土地使用成本、环境使用成本等均是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面临的日益严峻的问题。

四、中国开放型经济转型发展的主要障碍

综上所述,中国开放型经济亟待转型发展,这一点基本上也是学术界达成的共识。但是,转型发展并非是一个自然而然就可以顺利实现的过程,而是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原因在于中国开放型经济转型过程中还存在一定的难度和障碍。大体来看,目前中国开放型经济转型发展的主要障碍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 自主创新能力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开放型经济转型发展最根本的是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客观而论,以往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也是创新驱动,只不过其创新驱动的意义更多在于切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实现跟随、模仿和平面式创新,具有高强度投资的重要特征。此种意义上的创新与真正意义上的自主创新并非同一概念。虽然中国开放型经济经过多年的发展,自主创新能力有了一定的提高,但需要指出的是,创新能力的提高是一个动态发展和积累的过程,更具有研究成果向实际生产力转化的滞后特征,难以一蹴而就。因此,即便从某些指标(如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来看,中国的创新能力正在逐步提高,但就长期而言的“累积效应”还远远不够。所以总体来讲,中国的自主创新能力特别是原创力还不够强,尤其从全球分工的现实角度观察可知,中国的对外技术依存度还比较高,在某些关键产业

和关键产品的关键领域,核心技术仍然更多地掌握在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手中。也就是说,中国在核心技术方面总体上没有改变受制于人的大格局,这也是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在全球产品价值链和国际产业链中处于附加值较低环节的根本原因所在。

(二) 整合全球创新要素能力亟待培育

众所周知,当前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要素的跨国流动性日益增强,从而使得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优化配置和重新组合,国际分工形式也随之从传统的以产品为界限向以要素为界限拓展变化,即所谓的全球要素分工。在全球要素分工日益深入演进的背景下,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优势要素不再局限于本国或本地区的企业使用,而是可能被跨国公司所利用;同样,企业所能使用到的要素也不再局限于一个国家或地区内部所拥有的要素,而是可以通过“发包”或者“走出去”等方式利用其他国家的优势要素。从微观角度来看,全球要素分工的实质就是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整合和利用全球优势要素和资源。因此,在开放条件下,尤其是在当前全球要素分工深入演进的背景下,创新驱动完全可以建立在利用全球要素尤其是创新要素的基础之上。客观而论,过去中国开放型经济的发展受到自身要素禀赋结构的限制,这决定了中国在全球要素分工中主要处于“被整合”的地位。此外,中国企业“走出去”整合全球生产要素(包括创新要素)的能力还比较弱,具备“走出去”整合全球生产要素和创新要素能力的本土跨国公司数量也是极为有限的。

(三) 企业的创新驱动发展主体地位尚未完全确立

自主创新能力最终要落实到作为微观经济主体的企业身上。然而,从发挥企业主观能动性的角度来看,虽然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国在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做出了很多有益探索并取得了巨大进步,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尚未从根本上得到确立,企业微观活力难以得到有效释放,市场环境仍然需要进一步优化,政府干预仍然需要进一步减少,竞争机制仍然需要进一步增强。实际上,减少政府干预还可以避免政府因“好事做过头”而破坏了市场公平竞争秩序,进而从根本上扰乱企业技术创新环境的不良后果。正如有专家指出的那样,近年来以政府补贴方式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策略不仅没能在核心技术创新方面取得明显成效,反而导致了在低端产业链上“铺摊子”而带来的产能严重过剩问题,甚至存在被异化为圈地、争补贴和上投资的“锦标赛”现象。因此,如何通过进一步的改革让企业在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中发挥创新想象能力和选择自负其责的技术路线,会更加有效地激发企业的创新动力和市场活力,充分发挥“创新”要素的真正创新作用,实现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顺利转变。

(四) 创新驱动的体制和机制障碍需要尽快破除

实施开放型经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质就是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强政府的“服务”功能和作用,为此需要破除一切制约创新驱动的体制和机制障碍,提升劳动、技术、管理、信息、知识、资本的效率和效益,营造有利于实施创新驱动的政策环境和制度环境。但是需要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中国仍然存在着很多阻碍创新驱动战略实施的体制和机制问题。实际上,单从科技创新投入角度来看,近年来中国的科技研发投入快速增加,投入比重大幅提高,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科研成果不能转化为应用技术、利用效率低以及科技资源配置不合理等问题仍然存在,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体制和机制的障碍作用而造成的。比如,营造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环境有利于发挥市场竞争在激励创新行为中的根本性作用,然而不得不引起我们重视的是:在中国,制约创新的行业垄断和市场分割现象仍然存在;保护创新行为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尚需进一步完善;对于新技术、新产品、新商业模式的准入管理制度还需要进一步创新,尤其是要破除限制新技术、新产品、新商业模式发展的不合理准入障碍;在产业技术政策和管理制度方面,目前中国仍然以前置审批为主,尚未形成以事中监管和事后监管为主的有利于转型升级、鼓励创新的产业政策和管理制度,等等。显然,一系列体制和机制障碍的存在无疑成为中国开放型经济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所需突破

的一大难点。

(五) 开放型经济发展的综合服务能力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综合服务能力不足同样成为中国开放型经济转型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在中国前一轮开放型经济的快速发展中,政府的主导作用功不可没,但是政府干预过多往往会弱化市场的作用,也会出现一些弊端。因此,在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条件下,“强政府”应由主导逐步向提供服务方向转变,要强在提供高效的政府服务上,强在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上,只有如此才能真正发挥“强政府+强市场”的联合作用。然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中国当前促进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服务体系仍然不够健全,比如在开放型经济发展的管理模式上努力打造的“一站式”服务主要还是“串联”,还没有实现“并联”,进而影响了发展效率;对作为开放型经济重要发展主体之一的外资仍然通过以税收优惠为主的政策来加以吸引,而不是依托服务来增强吸引力。也就是说,提升综合服务能力是中国开放型经济在新起点上面临的紧迫任务。

五、中国开放型经济转型发展的具体举措

要进一步在扩大开放中实现开放型经济的转型发展和竞争新优势的培育,中国还需要采取切实可行的具体举措。为此,我们认为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好努力:

(一) 加快科技创新,实现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战略性转变

在中国前一轮开放型经济发展中,创新也是主要驱动力,但大部分创新属于模仿式、平面式,以高强度投资为主要特征,即面对西方产业技术的转移和扩散,我们以开放的姿态主动接受和积极融合,通过融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来实现产业发展的“开阔式推进”。在新阶段,与以往科技创新的路径和模式不同,要利用全球科技资源和全球智慧进行创新,实施更加开放的创新发展战略,这不仅意味着我们不能将科技创新简单地理解为增加研发经费投入或提高原始创新能力,还包括对以往的所谓“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开放式创新模式进行重新界定和理解,原因在于当前全球价值链正向创新链演变发展,这说明一个国家或地区可以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中分享创新成果,实质上变成了一种全球协同创新,从简单的“研发”转变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联发”。这种分工演进甚至会使得所谓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传统划分模式和边界日益模糊。制造链向创新链和服务链的拓展和融合、全球创新战略的调整、全球经济规则的改变等使得分工的深入演进会在国与国之间构建起知识、技术、信息等流通和共享的“管道”,这种发展变化赋予了创新驱动的发展战略以全新的内涵,即一定要以更加开放的姿态积极融入全球分工体系中,利用全球科技资源和全球智慧等创新要素,实现从简单的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开放型经济发展战略转变。为此,需要营造创新发展的环境,增强企业的创新能力,尤其是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这就要求政府放开市场准入,建立有序竞争、公平法治的市场环境,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和限制,给企业经营活动松绑,让企业拥有更多自主选择权,从而能够根据市场需求来决定创新投入方向。

(二) 从依托“人口红利”转向开发“人才红利”

开放型经济转型发展和竞争新优势的培育最终必然表现为人才竞争,从而进一步将开放型经济发展所依托的传统“人口红利”逐渐转变为“人才红利”。中国以往的开放型经济发展将“人口红利”发挥到极致,但随着这一优势的逐步丧失,新阶段应转变为发挥“人才红利”的作用。与以往利用“人口红利”不同,利用“人才红利”会发生一个显著变化,即范围不同。“人口红利”主要来自于国家内部,根本原因在于作为初级要素的劳动力跨国流动性;“人才红利”的集聚不再受一国国内所限制,因为与一般和普通的劳动力相比,高级和专业化人才的跨国流动性更强,因此,“人才红利”集聚效应的来源可以放眼全球。从更为宽泛的意义上讲,所谓的虹吸全球优质生产要素和全球智慧使得“人

才红利”具有真正的国际化意义,即我们不仅要拥有具有国际化意识和胸怀以及国际一流的知识结构、视野和能力达到国际化水准、在全球化竞争中善于把握机遇和争取主动的高层次人才,而且要在全球范围内积聚这样的人才。为此,我们应该大力倡导并努力践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2013年以来所提出的“终身教育是人才发展重要基石”等理念,不仅要打造出宜居、宜商、宜人的软硬件环境,从而为集聚人才奠定基础,还要依托互联网这一强大的工具,构建一个由学校教育体系和学校以外教育体系相互补充、相互融通、和谐发展且具有普惠、灵活、开放以及自主学习特点的终身教育体系。

(三) 以企业国际化为主体,加快推进“双向开放”

如果说包括集聚人才在内的高端生产要素主要是从“引进来”的角度来促进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转型和竞争新优势培育的话,那么另外一条重要途径就是通过“走出去”来整合和利用全球优质资源,以服务于中国开放型经济创新驱动的发展需要,其中培育本土国际化企业或跨国公司是前提。从既往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开放型经济转型发展的成功经验来看,在特定的阶段它们都实施了“走出去”的发展战略,但侧重点主要还在于产业的梯度转移方面,即为国内或区内的经济转型发展腾出空间。与既往成功经验相比,中国实现开放型经济转型发展和竞争新优势的培育,同样需要加大实施“走出去”战略的步伐,这是共同之处。然而,更重要的是不同之处,即在新的国际分工模式,尤其是全球价值链发展变化的新趋势下,加快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目的和意义不仅限于转移逐步丧失比较优势的产业,也不仅仅限于获取目的国的物质资本或攫取稀缺的矿物资源,更重要的在于通过“走出去”就地利用目的国的先进生产要素,尤其是高级人才来服务于国内研发能力的提升,促进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通过“走出去”充分利用资本、技术、产品、品牌等纽带,控制所在地的生产环节和阶段,将国内价值链延伸至国际市场,从而逐步布局价值链,从前一轮价值链的“被动参与者”或“被整合者”向全球价值链的“主动构建者”或“整合者”角色转变,这就要求必须以企业国际化为主体。为此,从加快我国企业“走出去”的角度来讲,打造并提升我国企业跨国经营的重点是要尽快实施可行的跨国公司培育计划,例如,可以试着确定一批具有一定经营规模和品牌知名度、拥有自主核心技术和研发能力的国内企业,使它们逐步发展成为有竞争力的跨国公司。此外,还要在鼓励和扶持重点产业“走出去”、鼓励和支持国内企业“走出去”重点区位选择、创新“走出去”的路径和形式、简化项目审批和经贸人员出入境手续、加大财政扶持力度、提高金融服务水平、加快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等方面做足功课。

(四) 继续发挥现有优势,注重打造综合成本竞争优势

推动中国从开放型经济大国向开放型经济强国转变,就必须在继续发挥现有优势的同时,注重打造综合成本竞争优势,为开放型经济拓展新空间。实际上,开放型经济中的区位优势不仅由普通劳动力等初级要素成本决定,还由综合成本决定。对此,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可以给出证明:在过去十多年里,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最大经济体不是中国,而是劳动力成本相对较高而综合成本相对较低的欧洲。这就要求我们在继续发挥传统比较成本优势的同时,在完善市场机制、提高制度质量、完善产业配套环境、提高政府效率、降低税费、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提高法制化水平等方面做足做够功课,打造出更具竞争性的综合成本优势。

(五) 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为经济转型升级提供制度保障

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不仅是迎合当前正在酝酿的高标准全球经济规则的需要,还是破除创新驱动体制和机制约束、创造有利于确立企业创新主体地位环境的需要,也是提升综合服务能力的需要。特别需要说明的是,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以开放倒逼改革”,从而内生地培育出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新优势,掌握全球经济未来发展主动权,这是因为无论是从攀升全球价值链高端角度还是从嵌入全球创新链角度来看,要培育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竞争新优势,依托科技创新是重中之重。科技创新的关键不仅在于是否拥有创新要素,是否能够集聚到进行创新活动的要素,

还取决于能否激发创新微观经济主体即企业的积极能动性。也正是基于这一意义,《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要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从具体举措上来看,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构建应着重在转变政府职能、改变开放型经济传统绩效评价机制、完善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的体制和机制、构建完善区域开放格局的有效动力机制、构建有利于培育企业国际竞争力的竞争机制、创新外商投资管理体制、建立促进“走出去”战略的新体制、构建开放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新机制等方面下足功夫。

参考文献:

- [1] 裴长洪. 经济新常态下中国扩大开放的绩效评价[J]. 经济研究, 2015(4): 4-20.
- [2] 张二震. 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的战略选择[J]. 世界经济研究, 2016(10): 6-8.
- [3] ECKHOUT J, JOVANOVIĆ B. Knowledge spillovers and inequality[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2, 92(5): 1290-1307.
- [4] 蔡昉. “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经验与针对性[J]. 经济学动态, 2011(12): 4-9.
- [5] FEYZIOĞLU T, PORTER N, TAKATS E. Interest rate liberalization in China [R]. IMF Working Paper No. 09/171, 2009.
- [6] 张德荣. “中等收入陷阱”发生机理与中国经济增长的阶段性动力[J]. 经济研究, 2013(9): 17-29.
- [7] 佟家栋. 国际经济保护主义的应对策略[N]. 光明日报, 2014-03-03(11).

[责任编辑:王丽爱]

The Predicament and Breakthrough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Open Economy in the New Stage

DAI Xiang

(Government Audit Institute, Nanjing Audit University, Nanjing 211815, 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in view of the phenomenon of “lack of power”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open economy, the representative view in the academic field holds that structural adjustment and power conversion can speed up the development of quality and efficiency. In fact, the speed and quality of the development of open economy is not contradictor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level of open economy can enhance the competitiveness, which is conducive to the pac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decline of China's open economic growth rate just indicates that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speed has failed to adapt to the new demand of the forced pressure, the cultivation of new competitive advantage has failed to fully compensate for the loss of traditional advantages. Faced with multiple forced factors of profound changes in the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environment, China's open economy needs to get rid of some obstacles to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in its development, accelerate th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and the cultivation of new competitive advantage.

Key Words: open economy;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ic growth pattern; economic transition and upgrading; comparative advantage vacuum; trade protectionism; financial crisis; new normal